

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

陈红兵, 王 聪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阳 110819)

摘要: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 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电视导致人的娱乐至死、电视造就了肤浅的图像时代以及技术对文化统治垄断。深入理解这些观点对于提升我国文化业的娱乐性、推进大众文化繁荣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文化业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尼尔·波兹曼; 媒介技术批判;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 G 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6)02-0164-04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2.012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il Postman' Criticism on Media Technology

Chen Hongbing, Wang Co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Neil Postma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dia Ecology, puts forward criticism on media theories in three points: amusing to death by television show, the age superficial image produced by television, and the technology monopoly over culture. 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thorough comprehending these ideas: enhancing the entertain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mass cultural market, and developing new mode of cultural industry by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Neil Postman; criticism on media technology; cultural industry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 尼尔·波兹曼以其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见和尖锐预言而著称于世, 其思想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媒介技术悲观主义色彩。在其媒介批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和《技术垄断》)中, 波兹曼以人文主义的角度批判了电视媒介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 而这三部著作也被认为是技术批判的启蒙读本。波兹曼反思了媒介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冲击, 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看作是一种可对社会造成难

以逆转的影响的不可控工具, 从而对媒介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持悲观态度。在我国大力推动文化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的背景之下, 深入思考波兹曼媒介技术批判思想, 探究媒介和媒介传播的规律, 对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即是从波兹曼媒介技术批判思想为基点, 结合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特点, 解读波兹曼媒介技术批判思想对于我国当代文化业的警示性意义。

收稿日期: 2015-09-02

基金项目: 2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ZX022)

作者简介: 陈红兵(1966-), 女, 教授。研究方向: 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E-mail: chenhb2066@126.com

一、电视的娱乐至死与文化业的娱乐性

波兹曼生活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的电视时代,对电视媒介的批判必然成为其思想关注的焦点。而在探讨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观点之前,必须对其媒介隐喻思想有所提及。“媒介隐喻论”是波兹曼媒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即“媒介即隐喻”,指媒介总是“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方式来定义现实世界”^{[1]11}。在波兹曼看来,人类所制造和使用的每一个工具和每一种技术都有着超越其本身的意义。“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1]11}。基于其“媒介隐喻论”的理论基点,波兹曼提出不同的媒介技术往往有着迥异的话语方式和象征符号。具体到媒介技术而言,波兹曼主张印刷媒介体现着秩序,拥有严肃、理性以及逻辑性强的特点。“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1]57}。而电视媒介则体现着散乱,拥有感性、依赖图像以及娱乐性强的特点。“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1]80-81}因此,印刷媒介隐喻着理性和阐释,直接催生了一个注重高度的理性和秩序的“阐释时代”。而电视媒介隐喻着感性和娱乐,使“阐释时代”逐渐消亡,最终形成了一个信息海量、娱乐至死的“娱乐业时代”。“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1]85}。

波兹曼对娱乐和娱乐业的批判固然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但必须指出的是,娱乐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娱乐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肯定和发展娱乐性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其中的缘由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技术的游戏起源说认为,技术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好奇心、兴趣,起源于游戏和玩具。“关于技术起源于游戏,尽管似乎是与技术起源于社会需要相悖的,但确有事实为依据,而事实是胜于雄辩也驳不倒的”^{[2]93}。例如中国古代的炸药、印刷术,近代的电话、留声机,以及现代的电视机和火箭等。“这些技术的起源都不是为了实际应用或创造美,而是来自游玩(play),起于玩具(toy),而且开始只是个人在玩”^{[2]93}。无论如何,人类对游戏或娱乐的偏爱催生了众多新技术的发明,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第二,娱乐性是人类寻求精神享受的重要内容,是人类使用技术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对娱乐性的追求促进了新技术的涌现,而新技术的出现又促进了娱乐性的发展和普及。通过娱乐性,人类社会得以五彩缤纷,人类的福祉也因此不断增加。第三,现代社会的新技术层出不穷,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合理地追求娱乐性必将促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市场特征是生产力的特性决定的,其意识特性决定了它又具有文化的消遣性、娱乐性、益智性”^{[3]145}。只有借助现代技术增添文化产业的娱乐性,才能立足于市场,吸引更多受众,以此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也保证受众正常需求的满足,促进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第四,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增添文化产业娱乐性,可以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硬性说教灌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原本僵化、封闭的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娱乐性进行传播,让游走在受众信息边缘的意识形态文化传播重新深入人心。

当然,波兹曼的电视媒介娱乐至死的观点,也提醒我们要防止文化产业中的过渡商业化和娱乐化,警惕无思想的玩物丧志,要注重经济性、娱乐性、益智性有机统一。毕竟,文化产业的背后从来不缺乏辨识能力较低的受众。充斥在文化空间的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式消息,千篇一律的造星式选秀,了无深意的肥皂式影剧,以及稗官野史的无厘头绯闻,这些景象总是让相当一部分受众趋之若鹜。他们享受着这种文化繁荣带来的多感官的愉悦,争先恐后地进行追逐,用感性的联想而不是理性的思考来搜寻和选择文化产品,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盲目性。当然,我国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没有发展到“娱乐至死”的程度。而只要进行合适的引导和规划,推动文化创新,使文化产业和科技进

一步有效地融合,避免任何形式的过度娱乐,就完全有能力避免走向波兹曼口中的“娱乐业时代”。

二、电视的图像时代与大众文化的繁荣

波兹曼认为,电视媒体具有感性的特点,电视非常注重图像的表达效果,是以娱乐为主导,以图像为途径,使社会逐步进入了图像的时代,而社会也围绕着电视媒介技术形成了新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的内容比较散乱,信息相对繁冗,没有特定的受众。因此,图像时代的另一个影响则是造成了信息的海量。因为图像形式的信息往往是凌乱而复杂的,其内在含义要比文字繁冗得多,使人们虽然在瞬息中得到了海量的信息,但却找不到有用的信息。在电视媒介技术所提供的娱乐和图像面前,清晰的逻辑和复杂的措辞基本派不上用场。社会生活中的各项事务,都要靠外在的图像进行展示,并用娱乐精神进行全方位的包装。原本严肃而真实的信息,日渐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展示出来,单纯地追求眼球效应和感官刺激。除此之外,由于依赖图像和感性的电视媒介对受众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要求较低,使任何年龄、任何层次的受众均可以畅通无阻地接受信息,因此模糊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凭借符号和电子这样的奇迹,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好的、坏的,兼收并蓄,没有什么神秘,没有什么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的”^{[1]118}。总之,根据波兹曼的媒介理论,电视媒介技术通过感性的图像使信息爆炸性地增长,助推了媒介的商业化,使娱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并将媒介技术的影响扩展到所有年龄层面。从此,电视媒介将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图像和娱乐业之下。

由于对印刷媒介下形成的“阐释时代”的推崇,波兹曼对“图像时代”可谓是全无好感。但从电视媒介开始的图像时代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第一,图像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内容。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思想分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思维表象在增加人类智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在依靠理性的理论思维的同时,还应通过感受、体验等方式加强形象思维,形成对事物的思维表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形成全方位的认识。第二,图像思维在从事科技创造

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图像作为形象化、具体化的表达符号,在科技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一些表达能力更强的图像形式也随之产生,使科技创造活动更加便利。第三,科技发展造就了图像时代的来临,有助于文化产业走向宜人性和易读性。注重图像的表达方式,可以便于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发展模式,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发展,满足文化产业受众的新需求,拓展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毕竟,“文化生产方式的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3]145}。

当然,为了促进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也要重视波兹曼对图像时代的批判,注意娱乐性和商业性的限度。在图像时代,依然要提出读书、培养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同时,为了防止图像时代的负面影响,也要加强波兹曼式的媒介素养教育。波兹曼认为,为了使教育能够成为维持社会平衡的力量,非常可行的方法就是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我们需要知道电脑、电视以及其他的重要技术形式怎样利用并控制了我们,而不只是去了解该如何利用它们”^[4]。而在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健全、文化产品良莠不齐的背景下,则要加强受众的文化素养教育,从而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而加强文化素养教育的最佳方式,无疑是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相比,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多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具有公益性和共享性的特点,通过公益性的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提高受众的文化素养。使受众能够全面的认识文化产业,并自主地辨识正面和负面的文化产品。正如媒介技术一样,国内外各种文化形态也有着自身的隐喻方式和话语方式,要避免成为文化的奴隶,就要让文化产业的受众了解各种文化形式的优劣以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在文化挖掘出隐喻与偏向,正确看待文化产业带给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图像时代,促进图像时代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技术文化垄断与文化科技融合的文化业新模式

在对媒介技术批判的基础上,尼尔·波兹曼提

出了技术垄断的思想,认为当今社会的文化是受技术控制、被技术垄断,文化逐步沦为技术的附庸,最终向技术投降。对于“技术垄断”,波兹曼将其解读为“低于信息泛滥的防御机制崩溃,社会所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5]42}。波兹曼认为,技术和人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肯定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却紧紧盯住技术的阴暗面,对文化受技术的侵蚀表示担忧。波兹曼把人类技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阶段、技术统治阶段和技术垄断阶段。人类文化大约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波兹曼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有控制机制,当控制机制被削弱时,失去效用的信息就成了混乱之源,而这又引起了机器意识形态的垄断。其中,波兹曼对于电脑技术尤其感到忧虑。他认为电脑使社会中的一切机构都实现自动化运行,使人不再注意这些机构是否必须以及如何改进这些机构。“我们能够看清的是,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的根基,使人相信技术革新等于人类进步”^{[5]69}。波兹曼还认为,在当今社会上,技术垄断已无处不在,以至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其踪影。技术垄断也使整个社会很难再意识到技术的起源和结果,走向唯科学主义和符号流失的桎梏。

根据波兹曼的观点,当代社会逐步沦为了技术的奴隶,原本作为防止对技术依赖的文化也逐渐成为了技术的附庸,这是他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得出的警世危言式思想。但如果跳出技术决定论的视野,从总体来看,技术和文化这两者之间其实一直是相互影响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和文化又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融合趋势,逐渐变为所谓的技术文化,并成为了当今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共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技术文化的作用要点主要可以阐释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始终具有文化属性。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文明进程中任何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有着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子,是在一定的文化中应运而生,又推动了文化形态的变化。任何将技术和文化完全割裂的观点都不足以完整地描述技术的全部。第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对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

一点对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启示尤其明显。将科技因素纳入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可以使科技中蕴含的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耗、低污染等特性与文化产业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第三,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使科技和市场进一步对接,推动产学研合作,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引领作用,促进国家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合力。

当然,波兹曼对技术文化垄断批判告诫我们要防止技术文化的过度张扬抑制其他文化的发展,应该注重各种不同文化形态协同发展。同时,波兹曼的技术垄断理论还启示我们需要注意精英文化的丧失,警惕在技术垄断状态下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无节制转化,适当地保护精英文化的正统性和纯洁性。

四、结束语

纵观波兹曼媒介技术批判思想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和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波兹曼对现代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分析独到而深刻,对认识媒介技术带来的娱乐化、图像时代以及技术文化垄断等问题,对于认识和分析当代社会特别是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波兹曼对媒介技术所批判的方面,是要注意防范和规避的。同时,波兹曼的媒介技术思想存在着忽视人的能动性的局限,他对政治经济因素估计不足,还带有一定的精英主义倾向,这同样成为了其媒介技术思想的缺陷。由于波兹曼思想存在的局限,使得人们有理由超越其思想,在波兹曼所反对的地方,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加以关注和认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无论是对波兹曼媒介技术思想的肯定还是否定,都无法掩盖尼尔·波兹曼媒介技术批判思想的智慧光芒。他悲观主义的技术批判不仅可以促使人们认识和把握媒介和技术的作用机制,还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社会文化,推动文化产业更加积极有序地发展,让每个受众都能成为媒介技术和文化产品的主人。

(下转第174页)

的需要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三,人类正处于一种双重过程之中:人机关系的人类化,人格的计算机化。在这个日益智能化的网络时代,由于网络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本质正在发生着变化。正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的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2]人不可能不受到并且自然而然地与其所创造的机器之间有一种对象化关系,人机关系逐渐地不再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人化关系。同时,新媒体新技术在日益人类化、个性化,并向我们的人格渗透。这些技术是如此迷人乃至会使人上瘾,技术在人类的自我身份中可能会成为“第二自我”。当人类直接与计算机相连,我们就与机器就更近了,甚至新媒体中的我们可能会成为“第一自我”。

最终,未来的人类将是何种模样?也许正如凯文·凯利在其代表作《失控》中论证的那样,“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他们正在如魔法师一般召唤出制造物和生命体并存的新奇装置。……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灰色冰冷的钢铁世界。相反,我们的技术所引导的未来,朝向的正是一种新生物文明。”^[13]

参考文献:

- [1] Powell W W.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s[M]//Cummings L L, Slaw B.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0, 12: 295-336.

- [2] [美]凯文·凯利. 新经济 新规则[M]. 刘仲涛,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 [3] [荷]简·梵·迪克. 网络社会[M]. 蔡静,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98-120.
- [4] Spohn W. The Laws of Belief: Ranking Theory and its Philosophical Application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5] van Eemeren F H, Garssen B, Verheij B, et al. Handbook of Argumentation Theory[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4.
- [6] [英]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宋兆霖,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5:2.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12-413.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3.
- [9] [美]杰里米·里夫金. 零边际成本社会[M]. 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0] 余源培. 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117.
- [11] 李良荣. “新世界”舆论法则:掌握传播主导权[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21(B01).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6.
- [13] [美]凯文·凯利.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M]. 东西文库,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3.

(编辑: 巩红晓)

(上接第167页)

参考文献:

- [1]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 章艳,吴燕蕊,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93.
- [3] 程建平. 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的社会价值辨

析[J]. 河南社会科学,2006(9):145.

- [4] Postman N. The End of Education, Redefining the Value of School[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6:44.
- [5] 尼尔·波兹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编辑: 巩红晓)